

从文化引步到政治起步

——论香山买办文化与中国近代化

王 杰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 广东 广州 510610)

[关键词] 买办; 买办文化; 近代化; 香山人

[摘要] 近代以降, 中外商通, 香山居地域之利, 得风气之先, 买办阶层最先兴起。他们躬身中西贸易, 内化了“商战”的理念, 揭开了近代“工业化”的真谛, 成为晚清及民初“工商立(救)国”的有力倡导者和实践者, 是为中国早期近代化运动的先驱。香山买办感悟西方文明的优长, 寻找中西之间的差距, 为缩短中西方文明的差距架桥铺路。通过实践与总结, 中体西用与经世致用互动升华, 逐渐成为知识商人团体中的新生力量, 重置了传统中国“士农工商”的社会排位格局。他们兼融中西文化内涵, 凸显“中西合璧”的韵味, 改变了中国社会心理与价值取向, 在“中转”欧西文明的同时, 潜移默化地向西方传播了中华文化的精华, 充当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前驱和中介, 对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变革和文化移植起了首开风气的重要作用。他们关注民族的前途和命运, 揭示了中国近代化的路向, 不失为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急先锋。

[中图分类号] K2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6425(2011)01-0088-07

买办在中国近代社会的功业与影响, 不容忽视。其表征呈横空出世、振聋发聩之效应; 中西兼融的文化内涵, 独步一时。他们“躬身”于商界, 首着先鞭于中国近代民族工业。与之同步, 又以“表率”的风貌冶中西文化于一炉, 在传统向近代转型的过渡时期充当了急先锋。他们忧国忧民, 关注民族的前途命运, 揭示了中国近代化的路向。限于学识, 本文所述之买办与买办文化, 仅以香山买办群体为中心。

一、横空出世: 重置士农工商的排位格局

历史的本身即是过程。“近代中国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 其中的事事物物都带有过渡性, 都充满着新旧质素的纷争与消长。”^[1]在中西方交流的初级阶段, 催生了一种“过渡性”的中介人物——买办。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 国门洞开, 欧美商人蜂拥东来, 抢占中国商机。随着中西经济交流的不断扩大, “中介”也随之增多, 并逐渐形成一个在经济收入上日渐显赫的买办群体。

香山扼珠江出海口, 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营

造了开放的文化氛围, 为买办的诞生孕育了历史文化土壤。明中期葡萄牙人租据澳门, 以及清初广州一口通商, 乃至鸦片战争后英国割占香港, 这都为广东尤其是香山大量出现买办提供了天时而地利。

凭藉毗邻港澳之“近水楼台”, 沐浴了欧风美雨的“先机”, 借“洋泾浜”英语的洗礼, 香山买办捷足登上了中西商贸的前沿。上海开埠伊始, 香山买办就占据了先机, 在与外贸和商业经营有关的洋行、商号、钱庄等洋场“抢占”了“制高点”。宝顺、怡和、琼记、太古等著名洋行的买办, 大多来自香山客^[2]。“19世纪60-70年代, 在上海有财有势的广东买办有徐宝亭、林清(阿康, A cum)、郑观应、唐景星和唐茂枝兄弟, 都是香山人。”^[3]香山的唐(廷枢、廷植)氏、郑(观应、翼之)氏、徐(钰亭、润)氏、莫(仕扬)氏等几大家族逐渐成为买办世家。

西方的“坚船利炮”仗势袭来, 清政府屈辱败阵、割地赔款, 近代西方文明与中国传统文明的巨大反差, 震撼着沉醉于“大邦”美梦和“孤芳自赏”

[收稿日期] 2010-08-11

[作者简介] 王杰, 男, 广东吴川人,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历史学博士。

的先觉者。买办就是介于中外商贸过程中的“先觉”群体之一。中国人从不缺乏吸纳和学习的精神，“先觉者”以西国胜在“利器”，故欲制敌，先治其器。于是，渐次引进西方器械和技术建设军工业，合资民用企业应时而起。在仿办西式企业的过程中，则须起用熟悉西方商业管理的人才。独具经营和资金优势的买办群体因此被卷入“洋务”运动，参与了近代化企业的创办，如轮船运输业、电信电报业、采矿业及纺织业等四大类民用企业。铁路、金融、银行、机器、码头、垦殖、保险、盐务、煤气、印刷等新式行业也随之创建，同时培养了一批本土的新型技术人才。买办的影响力开始从经济层面向社会政治层面渗透。这种转变，对提高买办的人生价值与社会地位具有“碑记”式的意义。

香山买办的“先觉”，表现于开风气之先。唐廷枢、徐润、郑观应等躬身中西贸易，内化了“商战”的理念，体悟了“工业化”的真谛，因而成为清末民初“工商立（救）国”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们感悟到：“商务者国家之元气也，通商者疏畅其血脉也”^[4]，提出“习兵战不如商战”思想，主张发展工商业，在朝廷创办的新式企业资金不足和经营不善时，投入资金和精力，引进西方的生产经营方式和管理模式，尝试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在制度创建和管理上体现“西体中用”的旨趣，逐渐将西方的股份制、保险机制、竞争机制、核算机制纳入洋务企业的管理中，迈出企业商办、制度管理、培养实用人才、多元化经营的路子，为近代中国企业发展积累了经验，为民族工业的发展探索模式。徐润慧眼独到，在呼吁“振兴商务”以追赶欧美的同时，强调为“我之利不使外溢”，宜急培养自己的人才，积极支持清政府派幼童赴美留学，升华强国富民之底蕴。

唐廷枢、徐润在中国早期工业化的进程中充当了先驱的角色。1873年，唐廷枢、徐润受李鸿章委派分任轮船招商总局总办和会办。唐、徐一经接手，就扩大资本，推出合股投资体制，实行股份转让，向社会公开发行人股票，使招商总局的股值年内升了一倍半，开中国股市之先河。还拓展了南洋运输业务，于菲律宾、泰国设立分局，开辟远航英国、日本、新加坡、夏威夷和美国的业务。轮船招商总局除了承运漕粮，还延揽商货，与太古和旗昌等洋行争利。1877年，轮船招商总局吞并了当时轮船运输业的老大——美国旗昌轮船，成为中国最大的轮船企业。1883年，唐廷枢奉命赴英

国考察，为北洋舰队订购船只。经元善曾说：“唐、徐声望素著，非因北洋增重。唐之坚忍卓绝，尤非后来貌为办洋务者可比。”^[5]

1876年，李鸿章委派唐廷枢主持开平煤矿。他从勘察矿址、拟定计划、招集资本到煤矿开采，都亲力亲为。经由唐氏之积极筹运，煤矿产量大幅度攀升，并带动了铁路和水路运输的发展。经他倡议和主持，建立了中国自营的第一条铁路——开平铁路、中国自营的第一家水泥厂——唐山细棉土厂。至19世纪80年代末，开平煤矿已占据天津整个市场，为矿务局的扩大再生产奠定了扎实的基础。1878年6月，上海《远东月报》撰文赞许：唐氏“破除旧时锢习，采用新法，集国人之资，用众人之功”，“又得国人之信任，所见之明无可及也。伊为中国未经创见最大方略之领袖”^[6]。1892年10月，唐廷枢辞世，郑观应致函盛宣怀称：“盖此公一生精力销磨于商务洋务之中，数十年来备尝艰苦，凡事不因仇怨，顾全大局，力图整顿，洵为吾粤中办洋务之特出者。”^[7]上海《北华捷报》载文称誉唐氏一生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时代”，“他的死，对外国人和对中国人一样，都是一个持久的损失”，“要找一个人来填补他的位置，那是困难的”^[8]。

徐润投资传统茶业和新兴房地产业，财富聚集迅速。1868年，宝顺洋行停歇后，徐润结束了买办生涯，成为民族资本家。他开设“宝源祥茶栈”，在河口、宁州、泮溪、江西九江、湖北洋楼洞、崇阳、湖南湘潭长寿街等处设立茶号，以茶栈带茶号，既担任买卖的中介，又投资贩运，自成购销系统。宝源祥茶栈的经营规模不断扩大，成为上海最大的出口茶叶的茶栈。徐润还在上海茶叶公所、丝业公所、洋药局、仁济医院（上海第一家医院）、格致书院任董事，创办同文书局。19世纪70年代，列强竞相在上海划定租界，各地富豪纷纷来沪开办工商业。徐润洞察上海百业振兴，万商云集，富庶甲于东南，地价日益趋贵，遂先购地3000亩，建筑楼宇320亩，造洋房50所，楼房、平房、临街馆房等2000余间，年收租金12万余两，成为风云一时的地产商。个人资产达341万两，其中房产占223万两，股票投资82万两，典当、钱庄等34万余两，一时富甲上海滩。

郑观应的“商战”理论，既源自洋行买办的经验，也得益于其创办近代企业、与外人“商战”的感悟。1878年，李鸿章派郑观应筹办上海机器织布局。1880年，郑氏为织布局总办，旋又为上海

电报局总办。1882年,受李鸿章之聘,郑观应出任当时难能维持的轮船招商总局帮办。上任伊始,即拟《救弊大纲》十六条上呈李鸿章,在得人用人、职责相符、赏罚分明、增加盈利、降低耗能等方面提出新举措并付诸实施。为回应太古、怡和洋行的削价竞争,他亲自与两洋行交涉签订了齐价合同。1883年10月,李鸿章擢升郑观应为轮船招商总局总办。1891年3月,郑氏由李鸿章委任为开平煤矿粤局总办,负责购地建厂,填筑码头。1896年,张之洞委任郑观应为汉阳铁厂总办。次年,兼任粤汉铁路总董。1899年10月,又兼任吉林矿务公司驻沪总董,广招股份。如是丰富的商旅历练,为郑氏的商战理论积淀了丰厚的思想资源。

香山买办以主动的姿态积极参与新式企业的创办与建设,被学人誉为19世纪颇具影响力的“中国近代企业的开拓者”^[9]。

香山买办不仅在19世纪的沿江沿海城市上海、天津、汉口、开平等投资现代民族工商业,还推动了故园20世纪的工商业开发。在两广总督张人骏和时任广州商务总会协理郑观应的支持下,香洲开埠可谓是一大创举^[10]。用现代的话语说,乃是在一片荒沙上建设一个商业开发区。《香洲商埠详细章程》第一章便开宗明义:“欧美以商务立国,以卫生殖民,此文化所以日进也。我国欲救贫弱,输入文明,当从商场、住场起点。况当此外界之风潮激刺,内地之水旱颠连,因以垦荒殖民,振兴商务,讲求土货,挽回利权,使我伟大帝国四百兆同胞卓然雄立于地球,以共享文明之幸福。此垦辟商埠之宗旨也。”^[11]

为国争利权——这一发自肺腑的呐喊,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代的最强音,《广东香洲商埠挂号收条》明示了爱国情怀的言词,曰“此收条乃系华人所用,如有外国人拾得及将此条转卖与外国人者,本埠一概作为废纸,特此声明。”^[12]这是何等民族气节的宣誓,是何等文化底蕴的张扬!

《香港华字日报》1909年4月23日(宣统元年三月初四日)四版《本报特电》载有关于“香洲开埠”之详细报导。

据载,香洲开埠盛况空前。其时,两广总督张人骏、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粤府劝业道陈望曾,省港澳及县城嘉宾倾巢出席。会后,众人选王诜等5人为“商埠总办”,王诜为埠主,是该县最早的商会组织,隶属县商会。

香洲开埠后,王诜继续集资10万银圆,招引

侨商巨贾,经两年多时间,填整筑路10条,建成大小铺户1000多间,其中两层楼房125座,“香洲酒店”等企业崛起。班航与移民日增,洋人亦来修筑教堂,市场日旺。奈何宣统二年(1910)7月,一间白铁铺突然失火,连环烧了6个小时,致厂店及八百寮屋烧毁殆尽,几千灾民流离失所,商埠一下成了废墟。

随着近代工商业的兴起,中国知识分子的组成结构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在“士农工商”的传统观念中处于末流位置的工商业者异军突起,特别是一群具有西方文化背景的洋行买办,他们在与外国商人的交易过程中,感悟西方文明的优长,寻找中西之间的差距,主动为缩短中西方文明的差距架桥铺路。通过躬身的实践与总结,中体西用与经世致用互动升华,逐渐成为知识商人群体中的新生力量。相对而言,他们比一般的读书人更有切身体会、切肤之痛,更具忧患意识。新生的买办知识群体,不仅着眼于与外人“商战”争利,更洞察中国政治制度落后,为政治的变革大声疾呼。在思想态度上,他们从忧患转为奋起;从社会地位上,他们从边缘人跻身社会的主流;他们异军突起而引领潮流的特殊建树,令正处于转型社会的世人刮目相看。因之,从社会观念上,潜移默化地颠覆了传统“士农工商”的排序。在近代中国史上,买办群体的崛起与创业及其在思想史上的冲击,可谓横空出世,影响深远。

二、中体西用:兼容东西文化冲突

香山买办乃是因中西文化最早碰撞而衍生的产物。作为第一批敢于“吃螃蟹”者,在谋生与从商的探索中,“自觉”兼容外来文化、潜在升华本土文化,也不断升华自己——从经济买办步入“文化买办”层次,承担起史无前例的引导与表率作用。这对他们自己来说,或许不是初衷。因之,在很大程度上说,他们对身后所引发的社会心理与价值取向的影响,或许也是始料未及的。

不同“质”的文明并不因质“异”而相斥,它们可以在一定的碰撞过程中互为吐故纳新。

香山买办的成长与事功,就说明两种不同“质”的地域文化相遇,并非对立、冲突那么单一与绝对,而是矛盾的对立统一。文化的构建,是一个内外整合的系统工程。文化接受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中会发生异质文化间的碰撞和融汇。文化间的互动与交流,最终走向兼收并容,优胜劣汰,从而升华为本土文化、塑造本土文化的

“兴奋点”。香山买办(文化)于一百多年前已经自觉为中国和世界当了先锋,做出了典范,将之称为买办文化,或许有着特殊的历史文化意义!

香山立百粤之南端。梁启超说:“吾粤僻处岭南,与中原邈隔,故在数千年历史上观之,其影响于国家政局者不甚大。虽然,以世界的眼光观之,吾粤实为传播思想之一枢要也。”^[13]自16世纪中叶葡萄牙人入据澳门伊始,西学首先以“商”为“桥”,通过澳门这一“桥头堡”,开始与中华文化交汇,催生出“中西合璧”的香山文化。而作为中西商务(文化)交流中介人的买办,先“游刃”于此。历经300多年的融汇,及至19世纪以降,香山被中外人士誉为“买办故乡”。一种包容、创新、敢为人先、底蕴深厚的买办文化诞生于香山一隅,并由此辐射神州大地。

香山买办之所以成为近代中国买办阶层中的佼佼者,在于其有一个庞大的群体且影响巨大。香山唐(廷枢)氏、徐(润)氏、郑(观应)氏、莫(仕扬)氏四大家族,他们对西方商业知识、生活习俗比较熟络,又粗通西语,与西商有较多的接触,因之香山人具有其他地方所不能比拟的优越条件^[14]。1843年,上海开埠通商,香山人几乎在与外贸和商业有关的洋行、商号、钱庄等行业占据了有利地位,宝顺、怡和、琼记、太古等洋行的买办,都以香山人为主。他们具有四个特点,即目光远大,视通中西;善捕良机,决策果断;脚踏实地,精益求精;融会中西,植根中华。这是香山文化的集中反映^[15]。香山买办以地缘、血缘关系为纽带,既利用外国洋行的信任,又凭借本土的人脉关系,从事买办和私营商业,成为近代中外贸易、洋务运动时期商业文化建设的先驱者和创造者。

买办群体既是商业上的买办,也是文化上的“买办”。在追求物质和精神生活质量的体验中,凸显了“中西合璧”的韵味:既时尚又不远离传统;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以弥补中国文化之不足,又不割舍中华文化根脉,恪守华夏文明;以半中半西的表征“言与行俱”,为时人展示中西兼融的时尚价值观和文化观,令时人趋之若鹜。

在居住方面,买办讲究“半中半洋”。建造房子,“没有外国建筑师可供利用,图样由外国侨商自行绘制,又为适合就地取材和中国技术而由中国营造商加以修改……”^[16],或修建中国传统建筑样式的园林和住宅,在室内则摆设着东西方各式家具。

在服饰方面,他们是最早着西装革履的中国

人,间或“蓝绸长袍和剃过的头上戴一顶绷紧紧的瓜皮帽”。

半中半西的文化心理,在郑观应的诗里表现得活龙活现。《罗浮待鹤山人诗草》与《罗浮待鹤山房谈玄诗草》两诗集虽然基本同名,主旨却大异其趣。前者言入世之志,阐发“治国平天下”之道;后者言出世之志,抒发修行炼仙之道。前者忧国忧民,悲天悯人;后者超然物外,吟仙咏道。《罗浮待鹤山人诗草》体现的是一个情感炽热的爱国诗人的形象,而《罗浮待鹤山房谈玄诗草》反映的却是一个热衷于道教的信徒。然而,两本诗集分工明确,几乎互不干扰,使我们很容易区分世俗的郑观应和宗教的郑观应,不致混淆。说到底,宗教信仰和政治信仰在郑观应的思想中终归是统一的,即先救世,后求仙;先度人,后度己。郑氏追求世俗的圆满和追求道教信仰的圆满最后得到矛盾的统一^[17]。

在信仰和社会生活方面,他们既受儒学、佛教和行会等传统价值观的影响,又别出心裁地仿效西式时尚,日常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兼容守常和趋新,从而成为最西方化且具有一定影响的中国人。买办作为一种新生的社会群体,在许多方面都逾越了固有的传统,为闭塞的中国展示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实践“洋为中用”,香山买办故事多多:他们努力将西方的现代技术嫁接于中华文明。1873年,在唐廷枢、郑观应、徐润等香山买办和香山籍官员叶廷眷等的支持下,容闳创办了《汇报》翻刻中外新闻^[18]。1875年,徐润引进先进印刷设备和技术,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机器印刷厂——同文书局,并于北京宝文斋觅得乾隆武英殿版《二十四史》《古今图书集成》和《资治通鉴》等书,陆续加以拓印。在所印书籍中,规模最大的是《古今图书集成》凡一万卷,名声大振。同文书局所印书籍,字迹清晰,装帧精美,颇受社会好评,被学界誉为“同文本”。《民国上海县志》有载:“以欧西石印法于文化事业裨益颇多,创同文书局,影印《图书集成》,及广百宋斋铅版书局,印刷书籍,艺林诧为创举。凡所规划,皆为中国所未见,而事事足与欧美竞争。”在运用西方印刷技术传扬中华文明方面,徐润虽不是第一人,地位却举足轻重。

就语言来说,他们不少人毕业于教会学校,或曾留洋,多能熟操英语,或“洋泾浜”。当时大多数国人在日渐频繁的中外文化交流中,仍受制于语言关。“因诸老友不通英语,吃亏者有之,受人

欺瞒者有之;或因不晓英语,受人凌辱者有之”,以及“贸易最大莫如英美两国,而别国人到来亦无不晓英语,是与外国人交易,总以英语通行。”^[19]唐廷枢编撰的《英语集全》用粤语注音,“分门别类,订缪指讹,莫不条分缕析,至吹舌音、卷舌音……尤发前人所未发,诚为习英语者之津梁也。”^[20]对于“广东英语”(洋泾浜)的推广、普及和提高,可谓“功”不可没,大大方便了外籍人士掌握汉语。上海开埠,进一步推动了“洋泾浜”风行。值得一提的是,透过该书的起名或能看出唐氏的智慧。其时,国人对英文的说法不相统一,如“英字”、“英话”等,《英语集全》问世后就只有“英语”这一称谓流传下来。

香山买办将中西文化上的互动提升到留学层次,可誉为里程碑式的创举。留学归国也曾当过买办的容闳,致力于“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的夙愿^[21]。1872年,清政府派遣幼童留美,即源自容闳的“教育救国”理念。容闳不仅参与筹划、组织,并全程陪同幼童留美,直至撤回。期间,徐润、唐廷枢等香山买办,亦参与选派幼童和资助幼童学业等活动^[22]。

香山买办在“中转”西方文明的同时,无形中也向西方传播了中华文化的精华。徐润创办的同文书局,不仅传扬了西方文化,也向外传播了中华文化。1890年,总理衙门向同文书局订购《古今图书集成》百部,增入考证20卷,凡5044册,至1894年印成。此书为总理衙门赠送外国政府的礼品。容闳使美期间,向母校耶鲁大学捐赠了大批传统文化书籍,这些典籍成为美国研究中国文化的重要见证。

香山既开放又保守的文化氛围,形成了值得关注的一种文化现象,即新旧文化兼容并存。有如陈序经在1939年发表的《广东与中国》一文中所指出:“广东是旧文化的保存所,又是新文化的策源地,因而粤人既是旧文化的守护者,又是新文化的先锋队。”^[23]这一文化现象极具象征意义。自清季以来新旧文化势不两立的思维定势在国人中影响颇大,实际上新旧兼容并存恰恰是文化复兴的重要原则,对中西文化有较深造诣的严复说过:“惟新旧各无得以相强,则自由精义之所存也”^[24]。

买办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作用与影响是多元的,作为“经济的”买办,促进了中国工商业的近代化;作为“文化的”买办,则充当了中西文化交

流的前驱。“在中西方经济交往和文化传播过程中,买办的中介角色不仅是具有代表性的,而且具有战略上的重要性,尽管这种接触的结局并非令人愉快,买办凭借自己的财富和专门知识,成为一种新式商人,在近代中国起了重大作用”^[25]。买办作为东西方的中介人,对于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变革和全面的文化移植起了战略性的重要作用^[26]。从经济和文化两个层面探讨买办的贡献后,我们还不难发现其第三个贡献,这就是政治上要求变革传统社会的理性呐喊。

三、盛世危言:振聳天朝大政视听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国难频仍而又急遽转型的近代社会,是一个难以让人隐居林泉、“独善其身”的时代。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香山买办名扬天下,尤其体现于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情怀与品格。于民族危难前夜,他们勇于呼吁政治改革,主张实行君民共主的立宪制,冀望朝廷重视西方政治制度和社会管理经验,实行有效的政治改良和社会改革。

“群雄各觊觎,权利暗侵夺。俄德窥北轅,法日界南辙。英复图中央,围棋布子密。或借港泊船,或租地筑室。…虎视兼狼吞,海疆终决裂。奋笔作此诗,字字含泪血。”^[27]

郑观应通过“商战”实践逐渐领悟到,与外人争利失败的根源在于政治的落后,并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方案,强调首要在洋务这一关键领域学习西方,赶上西方,而后改善政治与民生,以臻民富国强,长治久安。

郑观应的超人之处,是善于糅合中西学问,阐发其间的统一性,借以消除国人对西学的恐惧^[28],打破中国人牢固的“夷夏大防”观念,为中国文化的更新奠定了理论基础。他主张融汇中西,实行改革,富国强兵,救国图存。他将《道器》一文作为《盛世危言》的开篇,这不能不说是匠心独具。

《道器》篇指出:“故物由气生,即器由道出。…非举小不足以见大,非践迹不足以穷神。…不知虚中有实——实者,道也,实中有虚——虚者,器也。合之,则本末兼赅;分之,则放卷无具。…由是本末具,虚实备,理与数合,物与理融,屈计数百年后,其分歧之教必寝衰,而折入于孔孟之正,趋象数之学。”^[29]郑观应在这里借用两个范畴,一是“道体器用”,另一个是“器体道用”。他的意思是道和器两者是不可分的,因为规律是

不能脱离具体事物而独存的。道与器是对立统一的,可以相互转化。只有通过具体事物的研究才能发现其规律,而规律(道)是在具体事物(器)中才体现出来的。器载道,体现道,促进道通。这种思想,实质上是要说明西方的“器”是一种媒介,可将西方的“道”传播到中国来。它的意义是要求人们重视西方的“器”,将道与器放到平等、相辅相成的地位上,重视西方物质上的器,也为进一步学西学创造条件,做了很好的准备。

在郑观应看来:“道”是中国的好,“器”是西洋的好,“道”是本,“器”是末。实质上是试图在不触动“道”(封建统治秩序)的前提下,学习“器”(西洋富国强兵之法),以进行政治改良。《道器论》强调要点有二:一是倡行道器结合。在现实社会中,道与器是结合在一起的,“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西人虽不知大道之本,然而他们的形器之学却是不可缺少的。二是阐发“器可变,道不可变”,世间万物(包括国家政治经济制度在内)都是器,是可变的。

《道器》篇以郑氏的体用观为哲学依据,从理论上阐述体用、本末、道器之间的关系。强调“道”为宇宙本原,乃是为了解决洋务与中务、西学与中学之间的关系,从而为其改革主张提供理论依据。

郑观应从“道本”、“器末”思想引发出“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30],他把道——孔孟之道视为根本,把器——物质技术的形器看成是从属于道的。郑氏认为道是中国的好,因之须以中学为本,而器即以西洋为优,以是西学为末。因此,道与器必须结合,道要通过器而发扬光大,二者结合方能虚实兼备。

关于体用的界定,郑氏有意把“体”的范围缩小,而把“用”的范围扩大,甚至把政教法度、开议院、整吏治都纳入“用”的范围。举凡“西学”在“孔孟之常经”面前都是“大用”：“寂然不动,无声无臭者,道之体;感而遂通有情有信者,道之用。”他认为,西学重博,重器;中学重约,重道:“夫博者何?西人之所矚格致诸门,如一切汽学、光学、化学、数学、天学、地学、电学,而皆不能无所依据,器者是也。约者何?一语已足以包性命之原,而通天人之故,道者是也。”进而肯定中国文化重道、重虚的理论价值和西方文化重器、重实的实用价值:“学人莫窥制作之原,循空文而高谈性理,于是我墮于虚,彼征诸于实。”

西学为何物?郑氏认为应包括政治制度和科

学技术,“西人立国,具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其驯致富强亦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赜蹶趋步,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31]他强调中国只学西“用”而弃西“体”,即使铁舰成行,铁路四达,亦难臻富强。他把西学视为医治中国“危疾”的良方:“今日之洋务如君父之有危疾也,为忠臣孝子者将百计求医而学医乎?抑痛诋医之不可恃,不求不学誓以身殉而坐视其死亡乎?”以此为出发点,他把具有实用价值的西学都归为“器”,从而拓展了“用”的范围,突破了洋务派格致制造之学的窠臼。“故善学者必先明本末,更明所谓大本末而后可”^[32]。也就是说,西学西体合起来才是这“大本末”之“末”。西方的议会制度、学校制度、官僚制度、财政制度、司法制度等等,都是“今西人所用皆霸术之绪余耳”,对于清政府的改革自强富有借鉴价值。

《道器》篇附言一再强调:“器固不能离乎道”,“道又寓于器之中”,“道非器则无以显其用,器非道则无以资其生”。可见,道和器是互相渗透,互为表里,互相统一的。两者间的发展变化也并不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郑观应进一步论证,“孔氏云:‘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既曰物有本末,岂不以道之本,器为之末乎?”^[33]陈炽在为《盛世危言》所写的序中一语道明“道之中有器焉”、“器存而道亦寓焉”,可谓识郑观应道器论和本末观之精髓矣。

中西道器之辨,蕴含着直面强势文化渗透时的民族自尊与自信。中华文明乃重“形而上”之道,否定“道”的价值和传统,无异于否定中华文明自身。一个否定自我,全盘西化,迷失自尊,寄生于外来文明篱下的民族,出路安在乎!在突破传统文化樊篱、吸纳外来文明、增强中华文明活力的征程上,郑观应《盛世危言》的思想认识无疑是振聋发聩的。

经由郑观应《盛世危言》的启导,中国的政治思想史上翻开了追赶世界潮流的新篇章,这无疑也是香山买办对中国近代化的巨大建树之一。

曾几何时,夫子一句“逝者如斯夫”之咏叹,令千百年间华夏子孙荡气回肠。近世香山多盛事,渔村掬客引潮头。一百多年过去了,香山买办开拓近代化的风气令人精神一振——叩问青史,吾辈不该掩卷太息;弘扬先贤,乃是为了继往开

来。诚如埃及卢克索神庙法老像镌之名言：“我看到了昨天，我知道明天！”

[参 考 文 献]

- [1] 章开沅:《序》,虞和平著:《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 [2] 王杰:《绝代百载 风骚一时——论说香山买办与买办文化》,《岭南文化》,2007年第3期。
- [3] [美] 顾德曼:《家乡·城市和国家——上海的地缘网络与认同:1853-1937》,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41页。
- [4] 郑观应:《盛世危言·商务一》,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04页。
- [5] 《答友人论沪市情形之关系》,虞和平编:《经元善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8页。
- [6] 《徐愚斋自叙年谱》,《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八),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49页。
- [7] 夏东元:《郑观应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84页。
- [8] 《北华捷报》1892年10月14日,第562页。
- [9] 汪敬虞:《中国近代企业的开拓者》(下册),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 [10] 香洲与澳门相近,间有一片沙滩地,因位于香山场与九洲之间,故各取其中一字,起名“香洲”。
- [11] 据《香洲商埠详细章程》影印件(陈树荣先生赠)。
- [12] 据《广东香洲商埠挂号收条》影印件(陈树荣先生赠)。
- [13] 梁启超:《莅广东同乡茶话会演说辞》,《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九》,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4页。
- [14] 叶显恩:《香山文化与买办商人》,王远明、颜泽贤主编:《百年千年——香山文化溯源与解读》,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2页。
- [15] 熊月之:《上海香山人与香山文化》,《百年千年——香山文化溯源与解读》,第304-307页。
- [16] [美] 罗兹·墨非:《上海——现在中国的钥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4页。
- [17] 方志钦:《郑观应诗歌的爱国情怀》,王杰、邓开颂主编:《纪念郑观应诞辰16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澳门历史文物关注协会、澳门历史学会,2003年版,第149页。
- [18] 黄晓东、刘中国:《容闳传》,珠海出版社,2006年版,第26页;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53页。
- [19] [20] 《英语集全·唐廷枢自序》,转引郭秀文编著:《清代广州与西洋文明》,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1-132-132-135页。
- [21] 容闳:《西学东渐记》,徐风石、恽铁樵译,珠海出版社,2006年版,第23页。
- [22] 徐润所著《徐愚斋自叙年谱》记录了大量留美幼童的信息,成为后人研究幼童留美史的重要资料。
- [23] 《东方杂志》第36卷第2号。
- [24] 严复:《主客评议》,《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9页。
- [25] [26] [美] 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李荣昌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258页。
- [27] 郑观应:《罗浮待鹤山人诗草》,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95页。
- [28] 郑观应曾无情地批评那些“自命正人者”,指责他们“动以不谈洋务为高。见有讲求西学者,则斥之曰名教罪人,士林败类”。参见夏东元编:《盛世危言·西学》,《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72页。
- [29] [33] 郑观应:《盛世危言·道器》,《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42、241页。
- [30] [32] 《盛世危言·西学》,《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72、276页。
- [31] 《盛世危言·自序》,《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34页。

From Cultural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Beginning

WANG Jie

(Social Scientific Institute of Guangdong Province, Guangzhou 510610, China)

Key Words Comprador; The culture of the comprador; Modernization; Xiangshan people

Abstract Since modern times, China and the West had begun to trade. Because of the favorable geographical advantages, the comprador class rose in Xiangshan at first. They were compatible with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and they replaced the traditional pattern of social rank, also they created the national industry in modern China, they were fore-runners from 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 to modern transitional period. These compradors concerned about the people's lives and the future of the nation and they revealed the direction of the Chinese modernization.

[责任编辑:刘一兵]